

转型期的中国农村人口高彩礼婚姻

——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研究

魏国学 熊启泉 谢玲红

【摘要】 进入转型期以来,中国农村人口高彩礼婚姻屡见不鲜,彩礼水平飙升。高彩礼给农民生活和农村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使新农村建设面临严峻挑战。文章通过构建经济学模型,结合转型期中国农村的经济社会特征,对比转型前的农村特征,具体分析了高彩礼婚姻产生并蔓延的原因。

【关键词】 高彩礼 经济条件 差距

【作者】 魏国学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熊启泉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谢玲红 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起,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中国农村的婚姻消费呈现增加的趋势(刘豪兴、徐柯,2004),而且婚嫁费用的增速显著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速(姜旭朝、蒋贞灿,2005)。无论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还是发达的农村地区,作为婚嫁费用主要组成部分的彩礼均以惊人的速度攀升,致使许多家庭集多年收入也凑不够彩礼。

已有的少量研究只涉及极少数存在高彩礼现象的地区,实际上,高彩礼婚姻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已有星火燎原之势。包括甘肃、湖南、四川、安徽、河南、福建、贵州、广东、北京、吉林、内蒙古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农村均出现了高彩礼婚姻,与高彩礼相关的各种负面报道更是层出不穷。虽然国内鲜有学者研究过高彩礼的危害,但通过大量与高彩礼有关的报道,我们发现高彩礼除了让家长饱尝辛酸,给新郎、新娘带来累累债务外,其隐性危害更为严重,主要表现是:(1)高彩礼减少了农村的各项投资。由于男孩的亲事为万事之先,在彩礼未凑齐之前,无人敢冒险投资;男方借贷筹备彩礼,还款风险极大,致使实际利率上升,从而拉动农村整体利率攀升;高彩礼多被冲动地挥霍掉,难以转化为资本。(2)为避免人财两空,男方对新媳妇过分宠爱,导致青年妇女新婚几年内赋闲在家,减少了有效农业劳动力数量。(3)预期女孩将来可换得高彩礼,偏好男孩的夫妇不再担忧抚养女孩和逃避计划生育的高昂成本,从而超生直到生下男孩为止;女方家庭为获得急需的大额资金,会将女儿早嫁,导致早育,从而造成潜在的人口增长压力。(4)鉴于彩礼数额巨大,为了节省交易费用和牵制对方,部分农户被迫选择“换头亲”这种扭曲的婚姻方式。(5)如果多子家庭的资金只够一子的彩礼,父子、兄弟之间的矛盾会升级;家长只为高彩礼而嫁女,导致父女、母女关系恶化;没有感情基础的高彩礼婚姻也容易造成夫妻、婆媳关系不和。(6)引发大量民事纠纷。高彩礼诱使犯罪分子铤而走险贩卖妇女。高彩礼不仅阻碍了农村的生产发展,也恶化了乡风,进而使新农村建设面临严峻挑战。因此,

研究转型期农村大范围高彩礼婚姻的成因就显得格外重要。

绝大多数人类学家认为,彩礼是双方家长为了调整劳动力、财产权和社会地位的转移而采取的一种集体性策略(Schlegel 等,1988)。通过这种策略,女方家庭在嫁女儿时索取彩礼,彩礼既是对女方家长抚养费用的补偿,也是对其心理的补偿(孙淑敏,2005)。在女儿不赡养老人的中国农村地区,彩礼还可以降低女方家长的养老风险。但随着年轻人婚姻自主能力的提高和家庭结构的变化,因这种目的而产生的彩礼最终会消失(Goode,1963)。除了补偿作用,彩礼还有财富再分配的作用,彩礼趋向于对新婚夫妇提供资助,进而将新郎父辈或整个家族的财产权转移到新娘手中(Yunxiang Yan,2005)。另外,彩礼还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它体现了女性的尊严和价值(David 等,1994)。无论从文化、经济还是社会的角度看,彩礼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对于转型期的农村彩礼以远高于农民收入增速的速度飙升这一现象,人们普遍认为是“要面子”的攀比心理在作祟。此观点只是对这一现象的描述,未涉及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学术界由于受数据缺乏、文献过少等因素的制约,也未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究竟是哪些因素诱发了这一现象,本文试图通过经济学模型对其做出一些解释。

二、高彩礼婚姻的成因

对于中国农村的婚姻,本文假设:(1)无论是“父母包办”还是“自由恋爱”,男方在婚前都要向女方呈送彩礼;(2)女方家庭只会把女儿嫁给个人条件不比平均条件差的男性,但男方对女性的要求不多;(3)男女双方均能准确判断男性个人条件的优劣;(4)男方希望以尽可能少的彩礼娶亲,女方只能索取到男方愿意提供的最高限额的彩礼,即婚姻彩礼由男方的供给决定;(5)每个地区在各个时代都有一个平均(礼仪性质)彩礼;(6)高于平均水平的彩礼便是高彩礼。

男性能否娶亲,取决于其个人条件。当他的条件比周围同龄男性的平均条件差时,女方家庭便不愿把女儿嫁给他;相反,当他的条件不劣于平均条件时,只要机缘成熟,女方家庭就不会反对这桩婚事。上述观点可用以下两个概率式概括:

$$P_i(N|S_i/\bar{S} \geq 1) = 1 \quad P_i(N|S_i/\bar{S} < 1) = 0$$

P_i 是男性 i 娶亲的概率, S_i 是 i 的个人条件, \bar{S} 表示与 i 同龄的未婚男性的平均条件, N 代表自然选择(缘分)。上述式子表明,在提亲时,男方会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尽量使 i 的个人条件不劣于平均条件。

$$S_i(t) = C_i(t) I_i(t) B_i(t) Y_i(t) \theta_i \quad (1)$$

平均条件 $\bar{S}(t)$ 为:

$$\bar{S}(t) = \bar{C}(t) \bar{I}(t) \bar{B}(t) \bar{Y}(t) \bar{\theta} \quad (2)$$

婚龄男性 i 在时期 t 的个人条件 S_i 由式(1)决定: C 是人力资本,反映 i 未来创收能力的强弱,通过 i 的文化水平和职业等因素体现; I 为 i 的家庭财富,反映 i 继承财产的多少,通过 i 父辈的职业、家庭住房条件和家用耐用品等显示; B 代表 i 的生活、生产环境的优劣程度,通过其居住地的自然环境、公共物品供给状况等因素显示。此外, i 的家族声望、身体状况、人品、相貌、年龄等因素也影响其个人条件,我们将这些相对分散且不重要的因素归于随机项 θ , C 、 I 、 B 和 θ 共同决定了 i 的经济条件。更重要的是,在有彩礼的婚姻中, i 提供的彩礼 Y_i 也影响其个人条件。社会对各因素的看重程度决定了各因素对个人条件的贡献度,看重程度分别用 α 、 β 、 γ 和 θ 表示,它们的值越大,说明社会对相应的因素更为看重。 α 、 β 、 γ 和 θ 为外生参数,它们在不同的地区(时期)有不同的取值,但在同一地区的某一时期固定不变; C 、 I 、 B 和 Y 是时

间 t 的一阶可导函数,随机项 和时间 t 无关。

下面我们利用模型分析高彩礼婚姻产生和彩礼上升的原因。

(一) 高彩礼婚姻产生的原因

为了能花最少的彩礼娶亲, i 呈送的彩礼必须确保 $S_i = \bar{S}$, 用式(1)除以式(2), 再取自然对数, 得到:

$$Y_i = \bar{Y} e^{-\frac{A_i}{\epsilon}} \quad (3)$$

其中, $A_i = \ln \frac{C_i}{C} + \ln \frac{I_i}{I} + \ln \frac{B_i}{B} + \ln \frac{1}{\epsilon}$, 它表示 i 的相对经济条件, 彩礼和相对经济条件的关系如图 1 所示。只有在 $A_i < 0$ (i 的经济条件比平均条件差) 时, i 才会呈送高于平均水平的彩礼 ($Y_i > \bar{Y}$), 也才会产生高彩礼婚姻。随着 A_i 的减小, Y_i 的增速越来越快, 随着 A_i 的减小, 式(3)的曲线越来越陡峭。当 A_i 减小到一定值, Y_i 将变成男方财力无法企及的天价彩礼, 从而使经济条件太差的男性彻底娶亲无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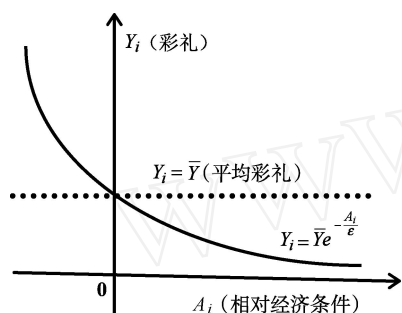


图 1 彩礼和相对经济条件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 如果婚龄男性的经济条件比平均条件差, 他就必须呈送高彩礼, 所以总会有一些“高彩礼婚姻”出现, 但是, 只要他们的经济条件和平均条件相差不多, 他们呈送的彩礼也只是略高于平均水平, 这种“高彩礼婚姻”只具有理论意义, 而没有实际危害。因此, 当婚龄男性的经济条件相差不多时, 便很难出现彩礼数额惊人的真正的高彩礼婚姻。改革开放前农村婚龄男性的经济条件相差不多, 高彩礼婚姻也只是“凤毛麟角”。转型期以后, 由于农村婚龄男性经济条件之间的差距扩大, 导致处于劣势的男性的经济条件与平均条件的差距变大, 从而迫使这些劣势男性呈送数额巨大的彩礼, 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高彩礼婚姻。婚龄男性经济条件的分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转型后, 少数男性的人力资本状况大大改善, 但绝大多数男性的人力资本提升缓慢, 可以粗略地通过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来验证这一点, 高中文化水平劳动力的比重从 1985 年的 7% 上升到 2004 年的 13%, 初中以下文化水平劳动力的比重依然很大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2005)。此外, 非农劳动力比重从 1985 年的 18% 上升到了 2004 年的 38%, 但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很大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2006a)。由此可见, 少数男性转到收入较高的非农产业, 但大部分男性依然在从事低收入的农业劳动。那些文化水平未能显著提高、依旧从事低收入农业劳动的婚龄男性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劣势更为明显。

其次, 农户间的收入差距在转型后逐年扩大, 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从 1978 年的 0.21 上升到了 2005 年的 0.38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2006b), 导致人数众多的中低收入农户的财富地位变得越来越低。

最后, 随着经济的发展, 部分地区可以享受到农业机械、交通通信、医疗教育、政策优惠等

首先, 婚龄男性文化水平普遍较低, 即使有部分男性受过教育或天生心灵手巧, 他们在农村无法获得施展人力资本的平台; 其次, 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很小; 最后, 无论是地理环境好还是差的地区的农民, 都很难享受到通信和机械等带来的高质量生活, 以上三点导致婚龄男性经济条件相差不多。

带来的优质生活,但那些自然条件恶劣、环境恶化和政府重视不够的地区却无法分享这些成果,导致这些地区的婚龄男性在生存环境方面的劣势愈加明显。

进入转型期以后,婚龄男性在人力资本、家庭财富和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出现显著分化,导致在上述方面有劣势的男性的经济条件和平均条件之间的差距变得很大,从而迫使他们呈送高出平均水平许多的彩礼,高彩礼婚姻由此而生。

(二) 社会评判标准与高彩礼婚姻的彩礼额

首先,农村人均纯收入已从 1990 年的 686 元上升到 2005 年的 3 255 元(国家统计局, 2006)。农户对稍微高出平均水平的彩礼不再敏感,彩礼对个人条件的贡献度减小,即 减小,保持其他参数不变,曲线 $Y_i = \bar{Y}e^{\frac{A_i}{\bar{A}}}$ 将沿着点 $(0, \bar{Y})$ 顺时针旋转(如图 2 所示)。在 $A_i < 0$ 时,新曲线(虚线表示)位于旧曲线之上,这说明,在经济条件上有劣势的男性需要呈送更多的彩礼。

其次,转型后,随着人力资本、家庭财富和生活环境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农户对这些因素更为看重,在这些方面有劣势的男性将被迫提供更多的彩礼。例如当农户比以前更看重生活环境时, 变大,保持其他参数不变,由于 $A_i = \ln \frac{C_i}{C} + \ln \frac{I_i}{I} + \ln \frac{B_i}{B} + \ln \frac{Y_i}{Y}$,在 $\ln \frac{B_i}{B} < 0$ 时, A_i 的值变小, Y_i 的值变大。

最后,转型后的平均彩礼水平 \bar{Y} 随着农户收入的增加而增多,使得曲线 $Y_i = \bar{Y}e^{\frac{A_i}{\bar{A}}}$ 和 $Y_i = \bar{Y}$ 一起向上移动(见图 1),导致所有男性(包括经济条件差的男性)都需要提供更高数额的彩礼。

转型后的农户已不再看重比平均彩礼高出些许的彩礼,而是将目光投向男性之间差距变大的人力资本等因素,在这些因素上有劣势的婚龄男性将不得不呈送高出平均水平更多的彩礼提亲,于是形成了数额惊人的高彩礼婚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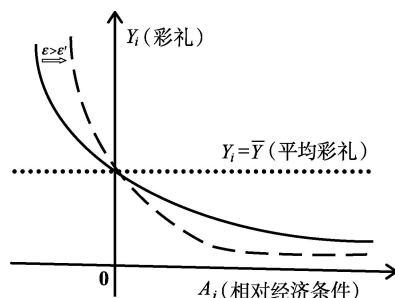


图 2 减小时的比较静态分析
注: > 表示彩礼的贡献度降低。

(三) 经济条件的分化速度与高彩礼婚姻的彩礼额

为了从另一角度研究彩礼上升的原因,用(1)式除以(2)式,然后取自然对数,再对式子两边求 t 的一阶导数,得到:

$$\left(\frac{\dot{S}_i}{S_i} - \frac{\dot{\bar{S}}}{\bar{S}}\right) = \left(\frac{\dot{C}_i}{C_i} - \frac{\dot{\bar{C}}}{\bar{C}}\right) + \left(\frac{\dot{I}_i}{I_i} - \frac{\dot{\bar{I}}}{\bar{I}}\right) + \left(\frac{\dot{B}_i}{B_i} - \frac{\dot{\bar{B}}}{\bar{B}}\right) + \left(\frac{\dot{Y}_i}{Y_i} - \frac{\dot{\bar{Y}}}{\bar{Y}}\right) \quad (4)$$

式中 \dot{S}_i 表示 S_i 对 t 的一阶导数,其他类似于此。

令 $S_i = \left(\frac{\dot{S}_i}{S_i} - \frac{\dot{\bar{S}}}{\bar{S}}\right)$,表示 S_i 增长率的离差,其他变量依此类推,为了娶亲, i 将尽可能使其个人条件的增长率大于或等于平均条件的增长率,即:

$$C_i + I_i + B_i + Y_i \geq 0 \quad (5)$$

在式(5)中,如果 $C_i + I_i + B_i < 0$,那么 $Y_i > 0$ 。换言之,当 i 经济条件的增长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增长率时,彩礼的增长率将大于平均彩礼的增长率。换言之,男性经济条件的分化速度越来越快,会导致劣势青年婚姻彩礼的上升速度大于平均彩礼的上升速度。如前所述,转型期婚龄男性经济条件的分化速度是不断加快的,高彩礼婚姻的彩礼额飙升也就在情理之中。

三、高彩礼婚姻的蔓延进程

如果高彩礼婚姻的范围只局限于少数经济条件比平均条件差的男性,那么高彩礼婚姻只是个别现象。然而,目前中国农村人口的高彩礼婚姻已变得很普遍。高彩礼婚姻不可能在朝夕之间变得如此盛行,其普及必然经历了相当漫长的过程。因此,本研究将高彩礼婚姻的蔓延进程分为 3 个交互进行的阶段,并探讨每个阶段推动高彩礼婚姻普及的主要动力。

(一)“陷阱”阶段

如前所述,经济条件低于平均水平的男性会陷入高彩礼婚姻“陷阱”,而落入“陷阱”的男性数量直接决定高彩礼婚姻的普遍程度。下面的模型将探讨陷阱阶段的高彩礼婚姻蔓延的原因。

在时期 1,社会普遍认同的男性平均经济条件的区间为 $[\bar{k}^1 - \delta, \bar{k}^1 + \delta]$,其中 $\bar{k}^1 = \frac{1}{n} \sum_{i=1}^n k_i^1$,表示婚龄男性的平均经济条件,是常数。 k_i^1 服从均值为 \bar{k}^1 ,方差为 σ^2 的正态分布。男性经济条件低于平均水平的概率对应于图 3a 中的阴影面积, $\phi(k_i)$ 是 k_i^1 的概率密度函数。

假设在时期 2,婚龄男性数量仍为 n ,但在该期分离出 m 位精英男性,他们的经济条件都明显高于 \bar{k}^1 ,而剩余的大多数男性经济条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该期所有男性的平均经济条件增至 \bar{k}^2 。此时,社会认可的男性经济条件的平均值区域变为 $[\bar{k}^2 - \delta, \bar{k}^2 + \delta]$,男性经济条件低于平均水平的概率对应于图 3b 中的阴影面积。显而易见,在时期 2,男性经济条件低于社会公认的平均水平的概率显著增大。换言之,将会有更多的男性落入高彩礼“陷阱”,高彩礼婚姻人群的范围明显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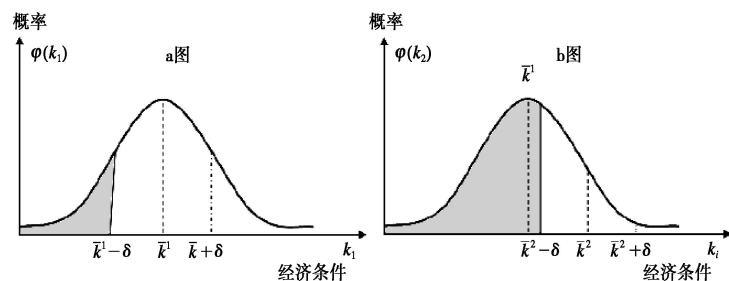


图 3 经济条件低于平均水平的概率

总之,在婚龄男性的经济条件未发生显著分化时,只有极少数男性的经济条件低于平均水平,但当一部分男性的经济条件迅速改善,同时绝大多数男性的经济条件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时,导致社会认可的男性经济条件的平均水平升高,就会迫使更多的男性卷入高彩礼婚姻,高彩礼婚姻

因此而蔓延。

(二)“传染”阶段

单独从道义的角度看,女方家长不会忍心向未来的女婿索要巨额彩礼而使女儿的婚后生活举步维艰,因此,女方家长只要觉得提亲的男性经济条件不错,便会同意这门婚事,而不会刻意等待愿出高彩礼的男方来提亲,从而延缓高彩礼婚姻的蔓延。但是,低收入农户在面对某些必需的一次性大额支出时,如果没有其他资金来源,便不得不等到有高彩礼提亲的男性出现才嫁女儿。换言之,这些支出“传染”到了待嫁的女儿身上。

我们可以将高彩礼婚姻的传染过程划分成家庭内和家庭间两种类型(见图 4)。如果家庭

在讨论方便且不影响结论的情况下,假设大多数男性经济条件的概率分布保持不变。

由于家长出于整个家庭境况的考虑,为了获取高彩礼改善家境,家长只能将女儿嫁给经济条件差的男性,而无法顾及女儿婚后的生活问题。

A 面临有成员接受高等教育或为儿子筹备彩礼等大额一次性支出,同时又没有其他资金来源,那么家长只有等到高彩礼才会嫁女儿,这便是高彩礼婚姻的家庭内“传染”。如果 A 的女儿和 B 的儿子结婚,那么 B 将面临大额的彩礼,B 又会等待高彩礼以嫁女儿,高彩礼婚姻通过联姻在家庭间连续“传染”,从而使高彩礼婚姻迅速普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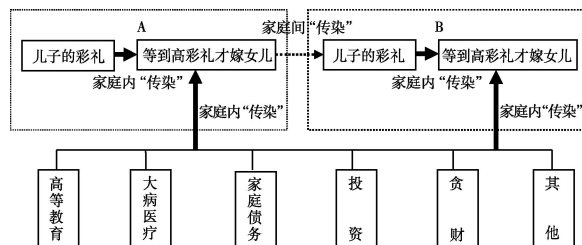


图 4 高彩礼婚姻的“传染”过程

转型后,农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多,农民也有了接受医疗服务的机会。但是,越来越昂贵的高等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负担已大大超出了普通农户的经济负担能力。转型后才出现的这两项大额一次性负担,迫使多子女的女方家庭等待愿意提供高彩礼的男方出现后才会将女儿出嫁。相比转型前高彩礼唯一的“传染”源——婚期相隔不远的男孩的高彩礼,转型后的“传染”源已变成 3 项甚至更多。此外,越来越多的农民在转型后外出务工,而务工人员以婚龄期的年轻人为主,不同省份或地区的年轻人有了恋爱、通婚的可能,高彩礼在家庭之间的传播范围进一步扩大。

可见,转型后农户的一次性负担加重,增加了高彩礼在家庭内部“传染”的可能性,流动人口的增多扩大了高彩礼的传播范围,通过这两种“传染”方式,高彩礼婚姻变得更为普遍。

(三) “示范”阶段

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和个别高彩礼婚姻的出现,社会公认的平均彩礼上升,而平均彩礼的上升迫使经济条件差的男性提供更高的彩礼,高彩礼婚姻的彩礼上升又使得平均彩礼上升(见图 5),这种恶性循环使得农村婚姻的彩礼不断上升。换言之,平均彩礼的数额在高彩礼的拉动下不断升高,即使大部分男性只需呈送平均彩礼便能娶亲,但他们呈送的彩礼额却不低,从而使高彩礼婚姻成为普遍现象。这种“示范效应”再次扩大了高彩礼婚姻人群的范围,同时使高彩礼婚姻变得像风俗习惯一样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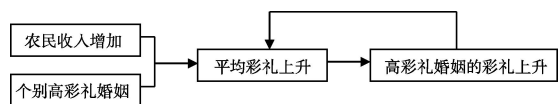


图 5 高彩礼婚姻的示范过程

四、结 论

目前学界对农村的高彩礼现象的研究相对较少,相关数据更是缺乏。本文只能通过逻辑推导和宏观层面的数据对高彩礼做出理论解释,主要结论如下。

在中国农村,女方很看重男方的综合条件(主要由人力资本、家庭财富和生活环境决定),其择偶方式也是比较中庸的。如果男方的综合条件和同龄男性的平均条件相差不多,用平均彩礼就能成功提亲。但当其条件明显比平均条件差时,只能高于平均彩礼提亲,才有可能促成亲事,差距越大,需要的彩礼越多。

转型前的中国农村落后而封闭,除农业劳动外,绝大部分男性别无选择,他们最主要的人

安徽省城调队对某县的调查显示,2004 年该县农村居民子女年均就学费用 6070 元,如果培养的是一名大学生,按 4 年制计算,需要花费 4.8 万元,而该县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只有 2 668 元(新浪财经,2005)。1998~2004 年农民纯收入年均增长 4%,但同期医疗费用的支出年均增长了 13%(国家统计局社会经济调查司,2004)。

力资本是体力,体力在个体之间的差距不大。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在那时候普遍较低也是不争的事实。另外,鉴于交通和通信等设备的匮乏,自然环境的优劣程度就显得无足轻重。这样就很难出现个人综合条件比平均条件差很多的男性,也就很少出现高彩礼。

进入转型期后,部分农村人口的生活出现了重大转机。有闯劲的男孩可以到城市打工谋求出路;心灵手巧的男孩在市场化的背景下能够转入收入较高的行业;经营有方的农户的收入迅速增加;汽车、收割机和手机等现代化工具在交通发达的村庄迅速普及。而部分平庸的男孩却只能继续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仅靠土地过日子的农户的财富很难增加。综合条件大为改善的男性的出现,使得女性的择偶标准(男性的平均条件)变高。平庸男孩的条件和平均条件之间的差距逐渐变大,他们被迫呈送高额的彩礼以弥补其劣势,高彩礼婚姻由此而生。

女方家庭一般不会为了高彩礼而把女儿嫁给条件差的男孩,但某些不得已的大额支出迫使女方家庭通过高彩礼筹资。转型期农户大额支出的形式多种多样,但主要包括家里男孩的彩礼钱、其他子女的高等教育费用和病人的医疗费等,各种重负让农户痛恨高彩礼却又不得不依靠高彩礼。随着人口流动范围的扩大,农民的通婚范围越来越大,使得那些原本没有高彩礼婚姻的地区盛行高彩礼。此外,随着信息在农村的传播速度加快,农民发现其他地方也盛行高彩礼婚姻,他们便对此习以为常,于是便出现了如此普遍的高彩礼现象。

总之,理性的农民攀比的不是彩礼,而是人力资本等因素,而他们恰好又准确地把握了农村内部差距不断扩大这一事实,再加之农户负担加重和农民通婚范围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户被卷入高彩礼婚姻。

多年以来,学术界和政府关注着不断扩大的城乡差距,但悄然变大的农村内部差距却未能引起足够重视。本文对高彩礼的研究只是开始,还需要系统而深入的实证研究。如汇总当前各地区的彩礼数额和彩礼对“三农”的影响;研究彩礼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用途;调查不同时期农民的择偶标准;获取不同时代婚龄男性的条件及他们所付彩礼的数据,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验证高彩礼的相关理论等。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06a):《中国农业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2.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2006b):《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3.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4、2005),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应年份。
4. 姜旭朝、蒋贞灿(2005):《农村婚嫁费用、女性人力资本与农村社会保障》,《东岳论丛》,第5期。
5. 刘豪兴、冯月根(2002):《乡镇社区的当代变迁——苏南七都》,上海人民出版社。
6. 刘豪兴、徐柯(2004):《农村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 孙淑敏(2005):《对甘肃东部赵村彩礼现象的研究》,《社会学》,第3期。
8. 新浪财经(2005):《中国农民教育负担沉重,供一个大学生需18年收入》(<http://finance.sina.com.cn/xiaofei/jiaoyu/20051219/13302210013.shtml>)。
9. 国家统计局(2006):《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10. David Hicks, Margaret A. Gwynne(1994), *Cultural Anthropology*. 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pp:141.
11. Goode (1963),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New York:Free Press of Glencoe.
12. Schlegel and Eloul (1988), Marriage Transactions: Labor, Property, Statu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90. pp:291-309.
13. Yunxiang Yan (2005), The Individual and Transformation of Bridewealth in Rural North China. *Journal of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11 Issue 4, pp:637-658.

(责任编辑:朱犁)

ABSTRACTS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Rural Labor Migration

Bai Nansheng · Li Jing · 2 ·

The paper studies the history since 1978,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trend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rural labor migration. In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China urbanization rate is still relatively low. The bias in the pre-reform era that the urbanization rate was lower than the industrialization rate has been changing. In terms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the amount of labor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is still too high, which is the biggest distortion of labor allocation. The most salient character of China's urbanization in the reform period is that it has resulted from breaking urban-rural divide. But due to social exclusion in employment, daily life and other aspects, most rural migrants can't settle down permanently in the state of so-called semi-urbanized. The issue of migrant workers has been imperative in China's urbanization. In the situation of fast economic growth China's urbanization will be accelerated, which calls for balanc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for the sake of justice. These changes generate new needs for policies with regard to rural migrants, but it is most important to guarantee a stable policy expectation to them.

Job Stability and Labor Earning Inequality

Luo Chuliang · 11 ·

Based on CHIPs 1995 and 2002,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effects of job stability on inequality in labor earnings in urban China. The findings in this paper show that the gap in labor earnings between stable job and instable job were enlarged, which mainly resulted from the discrimination by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However, the effects of job stability on labor earnings were various among quantiles. The premium of job stability was higher for the lower quantile of labor earnings distribution. The premiums from discrimination for different quantiles are also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Manufacture Product Trade on Employment i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34-Industry Panel Data

Yu Meici · 22 ·

The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manufacture product trade on employment in China based on 34-industry panel data from 1996-2006. We firstly estimate the whole employment effects of manufacture product trade, and then estimate the sectoral employment effects of manufacture product trade. From the result of the whole industry estimate, we find that expor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mployment, but import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employment. But from the result of sectoral estimate, we see that there are great industrial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export and import on employment. These findings have great implications for the trade and employment policies. In long run, it's necessary to encourage industrial export to increase employment, but the role of it should not be overemphasized, and instead the employment effect of domestic demand needs to be emphasized. It's unreasonable to limit industrial import because of its negative employment effect. We should expand industry import and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import goods. Different trade and employment policies should be adopted in different sector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comparative advantages.

Expensive Wedding in Transition Rural China

Wei Guoxue · Xiong Qiquan · Xie Linghong · 30 ·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marriages with increasingly high expenses of wedding happen frequently in rural China. Such a phenomenon has posed seriously negative impacts on peasants' life and rural development, giving rise to severe challenge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new countryside. We build an econometric model to explain the emergence and extension of marriages with high wedding expenditure in the rural areas with transitional characteristics, compared with the pre-transition rural characteristics.

Biomarker and Healthy Longevity among the Chinese Elderly: The Case of Left-handedness

Gu Danan and Others · 37 ·

Based on data from the four waves of the 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in 1998, 2000, 2002, and 2005,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factors that associate with a biomarker measured by left-handedness and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handedness biomarker and healthy longevity.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ose who are at young age, male, minorities, illiterates, higher birth-orders, infrequently participate in social and leisure activities, not with rice as the staple food, and residing in North are more likely to be left-handed by controlling for various factors. Analyses further show that left-handed elders are in disadvantages in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cognitive function, prevalence of chronic diseases, and overall health conditions, compared with other elders. However, no significant disadvantage in short-term survival was found among the lefthanders.

Urbanization Characterized by Migration Replacement

Liu Chengbin · 44 ·

China is experiencing a double process of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a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 in which the cities with high urban-